

中国考古学： 实践·理论·方法

□张忠培

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近照

序

几年前,一些朋友建议我编一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我虽感兴趣,但觉得主、客观条件仍不成熟,直到1993年春,才决定做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拟收进书中的论著目录。这年9月,在郑州西山考古工地将这个目录征求先后提出此建议的诸朋友意见。1994年3月,在他们的催促和帮助下才把现在名之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集子编成。

这本集子共收集15篇文章。其中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和《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三篇,分别是和黄景略、俞伟超及马淑琴合作写成的。无疑,《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虽把我处于作答的地位,其实也是我分别和徐天进、水涛、宋新潮、赵化成、周星、何努、李水城、李卫东以及贺云翱、谷建祥等朋友共同合作的产品。陈雍及李伊萍协助我作了《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的整理订稿工作。《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安徽省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据我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成初稿后,再由我改成的。此外,田建文作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及《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笔记,并整理成初稿。为编此书校读这些文章时,我和他们以及促成、帮助我结集的那些朋友交往、合作的情景,再次从脑中浮现出来,往返于记忆中,终究难能消失。

诸文校读情况,分为三类。一类,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等等,校读时,只字未动,这类占大多数;二类,这类数量较少,如《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等,只改了一些文字,原意未改;三类,只有一篇即《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

发表此文时,编辑部未曾和我们商量,即作了较多的删改,影响了原意,故这次依原稿发表。结集的这些文章,也可大致分为三组。一为通过对梁思永、苏秉琦及夏鼐诸前辈的学术著作的评论,即从史的角度论述理论、方法的。研史,是从今往前看,实则也是一种古为今用。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对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我很想就李济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论。至今,我基本上只读过他在大陆时发表的文章。他在1949年后于台湾发表的论著,我读的很少。故此,对他作些评论的愿望,终不敢付出实施,这是颇为遗憾的。二是直接谈理论、方法的。讨论的范围,大致包括: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何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运用问题,等等。理论、方法的可贵性,在于它的实践。我的讨论,面对现实,参与了考古学当前问题的讨论。三组,只有二篇,内容较杂。其主要内容,也涉及到了理论与方法。总之,这些文章是从中国考古学以往和当今实践进行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故将这集子取名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结集的动机,一是参与理论、方法的讨论,向同行请教,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学当前及今后一定时间内的实践中起点作用。总之,是为了引玉才抛出这些不成型的砖块。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先后分别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的课程。边研究,边授课,同时又认为有些心得且适时的讲义,撕了下来,整理后发表出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迫于朋友索稿,也写了两篇。1989年下台后,自己选择的主要任务,是还经手过的田野考古工作所欠下的《报告》债。但是,考古学问题讨论的诱惑,朋友们的催促,使我尽力压下的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时时浮了上来。《报告》债不还清,此书不能写,这是我既定的决心。于是,在压不住浮上来的那写《考古学方法论》的心愿的时候,又动起笔来,写了

四、五篇，以应付自己认为的当前考古学形势的需要。这就是写这些文章的大致的来龙去脉。现在把它们集结起来，仍然是我在可以预计的三、四年内写不成《考古学方法论》的缘故。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即听听同行们的批评，吸收意见，可用于日后写《考古学方法论》。

集子中的文章，写作的年代跨度，约有十多年。这期间的认识，我是有些变化的。如写《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时，是使用“地层学”一词，表示当用“层位学”这词才能表述的内涵，尽管当时已自发地感到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文中已萌生了这一思想，但直到后来写这类文章时，才径直使用“层位学”一词。又如写《浅谈中国考古的现在与未来》一文时，还认为“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及“农业考古”，是涌现出来的新学科，随后写的文章中，对这些认识至少是提出了质疑。还如我曾经接受一般流行的认识，把“历史”，有时甚至是“遗存”，当成了考古学研究对象，直到写《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时，才基本上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当然，还不止这些。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仅是说明自己认识的一些变化，同时，也是为向读者声明：如果看到这类矛盾的话，请以较后发表的认识作为我的观点。为此，我在每篇文章的后面，写了发表的时间，有的还说了成稿的日期。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发表后，我才认识到要讲清层位学及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必须先说明考古学研究对象以及什么是考古学，而要讲清考古学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考古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这样，我又接着先后写了《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等几篇文章。看来，我的认识是不自觉的，被所探讨的内在逻辑牵着鼻子走。

揭示居址、城址、墓地、矿场及作坊群址的平面布局，以及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或有谱系关系和无谱系关系的这类遗存，进行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可概称之为聚落考古。考

古发掘与研究,有以探沟揭示不同层位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以及它们的相对年代关系,有以单种器物或以器物群为单位的研究,也有以窖穴、窑、房屋或墓葬为单位探讨同类遗迹的演变,还有以居址、城址、墓地、矿场或作坊群址为单位进行的揭示、分析与检讨,在诸如此类不同层次或层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聚落考古处于较高的层次或层面。

聚落考古一词,始用于 80 年代,是从美国传入的。实质上的聚落考古,30 年代即已出现,殷墟宫殿区与王陵区的揭示,便是这类研究。自 50 年代起,先是以学习前苏联揭示特黎波里大面积发掘法,后是以全面发掘法名称所进行的居址和墓地的揭露,例如半坡居址、元君庙墓地以及一些城址的发掘与勘探,均可称之为聚落考古。至今,我国考古学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积累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珍贵资料,从中基本上能勾勒出从母权到父权、从村社到台城以及古代城市演变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目的性不十分明确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使我们丢失一些可以抓到的机遇和不少应得的信息。这当引起今后工作的注意。

揭示居址、城址、墓地等发掘对象中的同期诸单位的平面布局,是聚落考古的首要追求。这里所说的同期,最好不仅从类型学考察它们当属同一时期,同时从层位学研究亦可判断它们处于同一层位。这是从一般原则来说的,实际情况则较为复杂。例如,一连续兴建的而被废弃的建筑群,在不便确定它们是否处于同一层位和缺乏建筑使用时期留存的器物确定建筑的使用时代,只能据这些基址上留存的屋顶塌落下来的能反映兴建时代的瓦件的情况下,可能据它们兴建年代的差异而忽视它们实际上曾是一有机的整体。反之,被发掘出来的这同一建筑群,能被层位及瓦件说明它们兴建的先后,同时留存在这群建筑地面上的器物又能说明它们曾被同时使用过,那么,则给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情况。又如据器物类型学被确定为同时的诸村落,实际上有时,甚至往往并非存在于同一时期。随心举出的这几个可在工作中见到的情况,说明

聚落考古的复杂性和难度的同时,也从其中的例子可同时看出作聚落考古的客观条件,是研究客体的保存情况要好。同时应指出的是,搞清楚研究客体同期诸单位的布局,只是聚落考古的起码要求。透物见人,聚落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探讨住居、工作在同一村落、城市、矿场或作坊群址或埋于一墓地内的人们的关系,乃至同一或不同文化或政治共同体而生活在不同村落或城市,或埋在不同墓地内的人们的关系。因此,聚落考古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十分艰难的考古研究。其中相当数量的研究课题,是需要几代人有计划连续工作,才能见其端倪的。

基于上述,从宏观方面看,就得先把那些应当而又可以作聚落考古的那类遗存圈定保护下来,同时制定规划并选择人员适时地开展。另一方面,要获取一聚落内诸单位的平面布局,需要作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工作,如发掘好每个探方,从层位到器物类型等方面搞清楚每个单位的建造、使用和废弃年代,以及探明如路土迹象能表述诸单位交往而留下的这类遗存,同时,由于以往的考古证明,不同灰坑(其中有的是窖穴)、房址乃至墓葬内出土的不完整的陶器,有时可拼对复原从而形象地表述这些单位的同时性,这就要求打通单位拼对陶片。另外,地穴或半地穴内的遗存,往往是这类遗迹废弃后的堆积,而聚落考古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遗迹的使用年代。在此情况下,如何判断出这类遗迹的使用年代,以及可否从其废弃后的堆积大致推断出它们的使用年代?在探明遗存手段方面,聚落考古应基本采用探方发掘,需要具体研究的是,在何种情况下,只需使用探沟乃至钻探,亦可弄明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聚落考古要求探明聚落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可见,在考古学中处于较高层面或层次的聚落考古,不仅未能摒弃其它层面或层次的研究,反而对它们提出了更加精微的要求。

聚落考古问题,以往未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在此,对这一既是传统又颇为新颖的课题,借此有限的篇幅讲一点只能是不清楚的意见。

从中国考古学的丰富的实践中,去探索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这一认识的取得,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0年代前期,热衷于学习前苏联,轻视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当然就忽视从这实践中去探讨理论、方法。到1958年,把层位学,尤其是类型学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之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为教条,全面否定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从70年代后期始,开始回归到正确的轨迹,然而,自80年代后,又遭到从西方传来的新考古学的干扰。曲折与干扰,形式不同,实质则一。问题出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透物见人,还是搞从人见物,即从论到史;二是是否重视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去探究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古代除曾存在过相当发达的基本上属内陆文明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连绵不断,即史的过程的完整;二是多元一体,即史的多样性及其联结性。同时,当前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城镇化,破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从这古今中国环境成长发展的中国考古学,不只是仍处在蕴藏状态,已相当程度地裸露出如下引人注目的情景,即:研究工作规模巨大,和遇到的遗存丰富、多彩且具自身特色外,还存在时、空的连贯与联接性。正确的理论,是人们对所研究客体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认识;科学的方法,便是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新实践的途径。实践是理论的丰富源泉,同时,即使境外考古学从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的理论,可否适用于中国,亦得受中国考古学实践的检验。因此,作为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在上述中国考古学的情景面前,为了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地发展,和对世界考古学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应当于吸取国外先进考古学理论的同时,需著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

成稿于1994年4月16日

目 录

序.....	(1)
--------	-----

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

——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	(7)
------------------------	-----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	(18)
----------------------	------

中国考古学路上不会消失的足迹

——悼念夏鼐先生	(38)
----------------	------

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45)
-------------------	------

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	(58)
---------------------	------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63)
------------------	------

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84)
---------------------	------

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88)
------------------	------

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	(97)
------------------------	------

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	(111)
-------------------	-------

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32)
-------------------	-------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的检讨	(138)
-----------------------	-------

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	(143)
-------------------	-------

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	(150)
----------------	-------

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

——答《东南文化》记者	(164)
-------------------	-------

序

几年前,一些朋友建议我编一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我虽感兴趣,但觉得主、客观条件仍不成熟,直到1993年春,才决定做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拟收进书中的论著目录。这年9月,在郑州西山考古工地将这个目录征求先后提出此建议的诸朋友意见。1994年3月,在他们的催促和帮助下才把现在名之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集子编成。

这本集子共收集15篇文章。其中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和《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三篇,分别是和黄景略、俞伟超及马淑琴合作写成的。无疑,《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虽把我处于作答的地位,其实也是我分别和徐天进、水涛、宋新潮、赵化成、周星、何努、李水城、李卫东以及贺云翱、谷建祥等朋友共同合作的产品。陈雍及李伊萍协助我作了《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的整理订稿工作。《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安徽省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据我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成初稿后,再由我改成的。此外,田建文作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及《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笔记,并整理成初稿。为编此书校读这些文章时,我和他们以及促成、帮助我结集的那些朋友交往、合作的情景,再次从脑中浮现出来,往返于记忆中,终究难能消失。

诸文校读情况,分为三类。一类,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等等,校读时,只字未动,这类占大多数;二类,这类数量较少,如《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等,只改了一些文字,原意未改;三类,只有一篇即《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

发表此文时，编辑部未曾和我们商量，即作了较多的删改，影响了原意，故这次依原稿发表。结集的这些文章，也可大致分为三组。一为通过对梁思永、苏秉琦及夏鼐诸前辈的学术著作的评论，即从史的角度论述理论、方法的。研史，是从今往前看，实则也是一种古为今用。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对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我很想就李济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论。至今，我基本上只读过他在大陆时发表的文章。他在1949年后于台湾发表的论著，我读的很少。故此，对他作些评论的愿望，终不敢付出实施，这是颇为遗憾的。二是直接谈理论、方法的。讨论的范围，大致包括：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何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运用问题，等等。理论、方法的可贵性，在于它的实践。我的讨论，面对现实，参与了考古学当前问题的讨论。三组，只有二篇，内容较杂。其主要内容，也涉及到了理论与方法。总之，这些文章是从中国考古学以往和当今实践进行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故将这集子取名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结集的动机，一是参与理论、方法的讨论，向同行请教，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学当前及今后一定时间内的实践中起点作用。总之，是为了引玉才抛出这些不成型的砖块。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先后分别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的课程。边研究，边授课，同时又认为有些心得且适时的讲义，撕了下来，整理后发表出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迫于朋友索稿，也写了两篇。1989年下台后，自己选择的主要任务，是还经手过的田野考古工作所欠下的《报告》债。但是，考古学问题讨论的诱惑，朋友们的催促，使我尽力压下的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时时浮了上来。《报告》债不还清，此书不能写，这是我既定的决心。于是，在压不住浮上来的那写《考古学方法论》的心愿的时候，又动起笔来，写了

四、五篇，以应付自己认为的当前考古学形势的需要。这就是写这些文章的大致的来龙去脉。现在把它们集结起来，仍然是我在可以预计的三、四年内写不成《考古学方法论》的缘故。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即听听同行们的批评，吸收意见，可用于日后写《考古学方法论》。

集中的文章，写作的年代跨度，约有十多年。这期间的认识，我是有些变化的。如写《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时，是使用“地层学”一词，表示当用“层位学”这词才能表述的内涵，尽管当时已自发地感到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文中已萌生了这一思想，但直到后来写这类文章时，才径直使用“层位学”一词。又如写《浅谈中国考古的现在与未来》一文时，还认为“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及“农业考古”，是涌现出来的新学科，随后写的文章中，对这些认识至少是提出了质疑。还如我曾经接受一般流行的认识，把“历史”，有时甚至是“遗存”，当成了考古学研究对象，直到写《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时，才基本上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当然，还不止这些。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仅是说明自己认识的一些变化，同时，也是为向读者声明：如果看到这类矛盾的话，请以较后发表的认识作为我的观点。为此，我在每篇文章的后面，写了发表的时间，有的还说了成稿的日期。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发表后，我才认识到要讲清层位学及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必须先说明考古学研究对象以及什么是考古学，而要讲清考古学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考古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这样，我又接着先后写了《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浅谈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等几篇文章。看来，我的认识是不自觉的，被所探讨的内在逻辑牵着鼻子走。

揭示居址、城址、墓地、矿场及作坊群址的平面布局，以及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或有谱系关系和无谱系关系的这类遗存，进行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可概称之为聚落考古。考

古发掘与研究,有以探沟揭示不同层位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以及它们的相对年代关系,有以单种器物或以器物群为单位的研究,也有以窖穴、窑、房屋或墓葬为单位探讨同类遗迹的演变,还有以居址、城址、墓地、矿场或作坊群址为单位进行的揭示、分析与检讨,在诸如此类不同层次或层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聚落考古处于较高的层次或层面。

聚落考古一词,始用于 80 年代,是从美国传入的。实质上的聚落考古,30 年代即已出现,殷墟宫殿区与王陵区的揭示,便是这类研究。自 50 年代起,先是以学习前苏联揭示特黎波里大面积发掘法,后是以全面发掘法名称所进行的居址和墓地的揭露,例如半坡居址、元君庙墓地以及一些城址的发掘与勘探,均可称之为聚落考古。至今,我国考古学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积累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珍贵资料,从中基本上能勾勒出从母权到父权、从村社到台城以及古代城市演变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目的性不十分明确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使我们丢失一些可以抓到的机遇和不少应得的信息。这当引起今后工作的注意。

揭示居址、城址、墓地等发掘对象中的同期诸单位的平面布局,是聚落考古的首要追求。这里所说的同期,最好不仅从类型学考察它们当属同一时期,同时从层位学研究亦可判断它们处于同一层位。这是从一般原则来说的,实际情况则较为复杂。例如,一连续兴建的而被废弃的建筑群,在不便确定它们是否处于同一层位和缺乏建筑使用时期留存的器物确定建筑的使用时代,只能据这些基址上留存的屋顶塌落下来的能反映兴建时代的瓦件的情况下,可能据它们兴建年代的差异而忽视它们实际上曾是一有机的整体。反之,被发掘出来的这同一建筑群,能被层位及瓦件说明它们兴建的先后,同时留存在这群建筑地面上的器物又能说明它们曾被同时使用过,那么,则给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情况。又如据器物类型学被确定为同时的诸村落,实际上有时,甚至往往并非存在于同一时期。随心举出的这几个可在工作中见到的情况,说明

聚落考古的复杂性和难度的同时,也从其中的例子可同时看出作聚落考古的客观条件,是研究客体的保存情况要好。同时应指出的是,搞清楚研究客体同期诸单位的布局,只是聚落考古的起码要求。透物见人,聚落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探讨住居、工作在同一村落、城市、矿场或作坊群址或埋于一墓地内的人们的关系,乃至同一或不同文化或政治共同体而生活在不同村落或城市,或埋在不同墓地内的人们的关系。因此,聚落考古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十分艰难的考古研究。其中相当数量的研究课题,是需要几代人有计划的连续工作,才能见其端倪的。

基于上述,从宏观方面看,就得先把那些应当而又可以作聚落考古的那类遗存圈定保护下来,同时制定规划并选择人员适时地开展。另一方面,要获取一聚落内诸单位的平面布局,需要作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工作,如发掘好每个探方,从层位到器物类型等方面搞清楚每个单位的建造、使用和废弃年代,以及探明如路土迹象能表述诸单位交往而留下的这类遗存,同时,由于以往的考古证明,不同灰坑(其中有的是窖穴)、房址乃至墓葬内出土的不完整的陶器,有时可拼对复原从而形象地表述这些单位的同时性,这就要求打通单位拼对陶片。另外,地穴或半地穴内的遗存,往往是这类遗迹废弃后的堆积,而聚落考古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遗迹的使用年代。在此情况下,如何判断出这类遗迹的使用年代,以及可否从其废弃后的堆积大致推断出它们的使用年代?在探明遗存手段方面,聚落考古应基本采用探方发掘,需要具体研究的是,在何种情况下,只需使用探沟乃至钻探,亦可弄明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聚落考古要求探明聚落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可见,在考古学中处于较高层面或层次的聚落考古,不仅未能摒弃其它层面或层次的研究,反而对它们提出了更加精微的要求。

聚落考古问题,以往未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在此,对这一既是传统又颇为新颖的课题,借此有限的篇幅讲一点只能是不清不楚的意见。

从中国考古学的丰富的实践中,去探索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这一认识的取得,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0年代前期,热衷于学习前苏联,轻视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当然就忽视从这实践中去探讨理论、方法。到1958年,把层位学,尤其是类型学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之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为教条,全面否定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从70年代后期始,开始回归到正确的轨迹,然而,自80年代后,又遭到从西方传来的新考古学的干扰。曲折与干扰,形式不同,实质则一。问题出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透物见人,还是搞从人见物,即从论到史;二是是否重视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去探究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古代除曾存在过相当发达的基本上属内陆文明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连绵不断,即史的过程的完整;二是多元一体,即史的多样性及其联结性。同时,当前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城镇化,破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从这古今中国环境成长发展的中国考古学,不只是仍处在蕴藏状态,已相当程度地裸露出如下引人注目的情景,即:研究工作规模巨大,和遇到的遗存丰富、多彩且具自身特色外,还存在时、空的连贯与联接性。正确的理论,是人们对所研究客体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认识;科学的方法,便是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新实践的途径。实践是理论的丰富源泉,同时,即使境外考古学从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的理论,可否适用于中国,亦得受中国考古学实践的检验。因此,作为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在上述中国考古学的情景面前,为了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地发展,和对世界考古学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应当于吸取国外先进考古学理论的同时,需著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

成稿于1994年4月16日

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

——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

思永先生对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先生于1954年与世长辞，已二十七年了。尹达、夏鼐两位先生对他已作了科学的评论^①。但在以后相当长时期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老一辈考古学者的学术成果，往往得不到正确评价，甚至遭到有意的抹煞。恢复学科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拨乱反正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年是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趁此机会，我们谈谈思永先生对后冈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他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的学术成就及意义，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以作为对这位考古学前辈的深切怀念。

—

后冈遗址的发掘，距今恰好整整半个世纪。这期间，尤其是1949年以来，我国政治制度的变革给考古事业的发展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以及由于广大考古工作者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地辛勤劳动，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体系。在今天，科学地发掘一处多层遗址并正确地处理其分期问题，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一定都具有重大的或深远的学术意义。但在半个世纪以前，科学地发掘一处多层遗址，并正确地处理其分期问题，却很不容易。正是在这方面梁思永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同上。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列宁的这段
话，无疑也适用于评论一位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科学成
果。因此，当我们评价思永先生对后冈遗址的发掘时候，只有从
他所处时代的考古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同他以前和以后的考古
学者的学术活动的联系中，才能对这次工作的成果及其学术意义
作出客观的估价。

现代考古学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才在我国兴起的。1931年
发掘后冈遗址以前，瑞典人安特生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
址^②，河南浍池仰韶村遗址^③，并在甘肃、青海一带作过考古调查
和试掘^④；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⑤；前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三次发掘安阳殷墟^⑥，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
遗址^⑦，和调查并试掘了昂昂溪和西喇木伦河流域诸遗址^⑧。这些
工作，使当时学术界认识到黄河流域除了殷文化外，还存在仰韶、
龙山、齐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等古代文化遗存，嫩江和
西喇木伦河流域存在着含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从而打破
了金石学和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学的治学传统，开拓了
它们不可问津的新的历史学领域，显示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生命力。
但是，由于当时发掘遗址是采用以深度计分地层和脱离地层的类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② 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地质调查所。

③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地质调查所。

④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地质调查所。

⑤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

⑥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又刊载在《安阳发掘报告》一、二期有关文章。

⑦ 《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⑧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